

明代《三峡通志》的编纂及其旅游文化价值[※]

◎ 高 远

【摘 要】明代吴守忠编辑的《三峡通志》是唯一一部关于三峡的志书，丰富了古代史部地理类文献的类型。

此书流传不广，明清及近现代有关三峡之介绍或专门著作几乎未提及。《三峡通志》不但在方志编纂、版本校勘、佚文辑录等方面有文献史料价值，还可以用来了解人物资料、地方风俗、名胜古迹、典故传说等，为当今三峡旅游文化的发展提供历史借鉴。

【关键词】《三峡通志》；三峡；旅游文化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139(2011)05-0179-5

《三峡通志》上世纪50年代初由上海图书馆从造纸厂废纸中救出，现藏于上海图书馆，为明代万历十九年（1591）刻本，二册，各类目录均无记载，疑为传世孤本。1991年5月，北京中国书店曾将其所藏《三峡通志》抄本交由杭州富阳古籍印刷厂影印出版，全书一函二册。抄本无确切抄录年代，版心下方题“锦生馆”，何人抄写、抄写于何时？尚待考证。《续修四库全书》编纂时，将上海图书馆所藏的《三峡通志》收入其中，存于第848册《史部·政书类》。据笔者所知，目前学者研究《三峡通志》的专文仅有两篇：沈津先生的《明代

有关长江三峡的志书——〈三峡通志〉》、王世伟先生的《传世孤本明版〈三峡通志〉考略》。沈文文字不多，属提要式的古籍介绍；王文相对而言比较详细，主要分析的是《三峡通志》的文献价值，比如方志编纂、版本校勘、佚文辑录等。本文的论述侧重于《三峡通志》的编纂及其旅游文化的价值。

一、《三峡通志》的编纂概况

三峡文献有着浓厚的三峡地方色彩，反映三峡文化和社会发展的演变，是三峡信息资源中极

※ 【基金项目】重庆市2010年度社会科学规划特别委托项目“三峡历史文献整理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010TBWT04）。

〔作者简介〕高远，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副研究员，重庆 400015。

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古代学人所留下来的三峡文献,多侧重于诗歌词赋铭记以及与三峡地区相关的史实等,而专门论述三峡的志书却是空白。到了明代,吴守忠编辑的《三峡通志》,成为唯一一部关于三峡的志书。由于当时刊刻不多,且皆赠送同好,又限于当时之地理及交通条件,致使此书流传不广。明末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及《四川通志》、《湖北通志》的“艺文”中皆未列入,明清及近现代有关三峡之介绍或专门著作也并未多提及。

《三峡通志》题“明·吴守忠编辑、明·庐国祯校次”。关于编者吴守忠,薛新力先生主编的《巴渝古代要籍叙录》中介绍为:“吴守忠,河南河内人,明正德九年考取二甲第七十五名,余不详。”^[1]此论述太简略并有讹误。《三峡通志·小引》末有“豫章吴守忠谨识”语,豫章为古郡名,治所在今江西南昌,知吴守忠是江西人无疑。查清雍正十年(1732)刻本《江西通志·选举》记载:

“吴守忠,上高人,归州知州。”《三峡通志》谓明代三峡“为府者一,夔州府;为州者二,夷陵州、归州”^[2]。归州为古地名,唐代时置,属湖北宜昌府。据清李圻重修的《归州志》,其中卷五“州牧”条下有“吴守忠”名字,可佐证其曾在归州任职。又据清同治十年(1871)刻本《高安县志》记载:

“吴守忠,禾溪人,上高,学龙岩知县,升归州知州。”清光绪十六年(1890)重刻《龙岩州志》中的《秩官志》与《政绩志》中对吴守忠有较多的记载,如《政绩志》中记载:“吴守忠,高安举人,万历十七年知县事。甫莅任即革里班陋规。……尤工诗古文辞,修邑志。”《龙岩州志·政绩志》还有专门介绍吴守忠政绩的《明知县吴守忠六议》篇目,并记载有吴守忠编纂方志一事。由此可知,

“吴守忠工于诗文,《三峡通志》中多辑有诗歌词赋铭记,正是纂修者的专长,同时也形成了《三峡通志》的文学特点。”^[3]

关于《三峡通志》的编纂时间,我们可以根据《小引》中的叙述进行推算,其中言:“己丑岁,余量移此州(归州)”,明万历十七年(1589)为己丑年,吴守忠在此年由龙岩知县迁官至归州任职。又

言:“万历辛卯秋七月既望,豫章吴守忠谨识”,万历辛卯,即万历十九年(1591),由此可知《三峡通志》的完成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

关于《三峡通志》的编纂意图及所依据的史料来源,作者在《小引》中说得十分清楚:“己丑岁,余量移此州,日上府受事多苦后期,常冒险下峡,岁不啻七八往,今且二岁矣。……而州鲜藏书家,即求古峡中记,以供卧游未能也。于是出所携《一统志》、《楚蜀通志》,旁以荆夔诸郡邑志,会而粹之。”由此可知,《三峡通志》是吴守忠在秭归任知州时“常冒险下峡,岁不啻七八往”的耳闻目睹,“运用第一手的三峡情况,参以各种有关志书而写成的我国第一部游览三峡的导游著作。”^[4]

《三峡通志》共有五卷,卷一为“三峡异同”、“三峡中额设公署卫所”、“夔峡考”、“巫峡考”、“归峡考”、“诗”、“赋”。卷首两部分是对有关三峡的记载以及作者对三峡中额设公署卫所的考证,其内容较为简略;“三峡考”主要是对其中的行政区划、山川地名、名胜古迹等加以稽考辨析;所录的“诗”、“赋”是第一卷中所占篇幅最多的内容,是有关总论“三峡”的诗文。卷二为有关夔峡的五言、七言诗及“歌”,“词”,“赋”,“记”。卷三为有关巫峡的“诗”、“歌”、“赋”。卷四为有关归峡的“诗”、“记”、“序”。卷五为附录,按内容又可细分为十四类,即帝王胜迹、圣贤过化、名宦流芳、乡贤遗响、达人流寓、一统芟夷、偏安窃据、江神显应、岩洞搜奇、崩洪纪异、守江集议(上下)、峡俗丛谈、峡志杂录、楚襄王神女。整部书后有兴山知县旷驥的《三峡通志·后跋》,赞其“指顾而披阅所得,虽常目在之无踰,是悉大夫谓卧游信矣”。

《三峡通志》中作者所引用的文献书名、篇名有《荆州记》、《峡程记》、《水经》、《入蜀记》、《图经》、《向王山志》、《元和志》、《茶经》、《大禹谟》、《夔州志》、《许正吾集》、《建始志》、《一统志》、《守夔稿》、《湖广通志》、《明道杂志》、《文昌化书》等等。上述部分书籍今已不存,这些书籍中有关三峡的风俗及灾异史料仅赖《三峡通志》而得以保存。《三峡通志》具有文

学性的特点,据王世伟先生统计,“《三峡通志》所辑文学作品共计209篇(首),其中有梁简文帝《蜀道难》等诗148道(笔者注:应为“首”),有刘禹锡《竹枝》等歌10首,有鲁璠(笔者注:应为曾璠)《瞿塘感怀词》等词25首,有郭璞《江赋》等赋6篇,有陆游《入蜀记》等铭记20篇。”^[5]

《三峡通志》的编纂特点,其一为“重志峡”。吴守忠在《小引》中言:“首夔峡,其次巫峡,归峡又次之。虽山川并列,而于滩沱独致详焉,重志峡也。”《三峡通志》与古代方志编纂体例一脉相承,《四库全书总目》史部地理类序云:

“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然《禹贡》、《周礼·职方氏》,其大较矣。《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盖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6]在明代以前的历史地理文献中,有山志、水志、河志、堤志、湖志,而鲜见峡志。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三峡通志》虽体例承续古代志书,但其在方志编纂中独辟蹊径,专为‘三峡’撰志,在历史地理文献中增加了峡志类型,不能不说是一大创造,也丰富了古代史部地理类文献的类型。”^[7]其二为采摭史料丰富,既有反映三峡历史沿革的文献,又有关乎三峡地区的诗词歌赋铭记文献,所谓“文自宋大夫而下,诗自魏晋而下,汇编胪列,雅俗具陈,凡事与人之有系于斯地者,亦附著焉”^[8]。其三,全志编排有序、剪裁得当。从卷五附录所辑的十四个方面来看,分类详细,主题清晰,在方志编纂体例中较为少见。书中所选录的诗词赋记等文献都是从著名诗人、文学家作品中精选出来的,说明作者选材的典型性与良苦用心。

总之,《三峡通志》是中国方志编纂中体例较为精当的一部“峡志”,在方志编纂、版本校勘、佚文辑录等方面都极具文献史料价值。

二、《三峡通志》旅游文化价值探析

对于三峡旅游文化,“我们初步界定为系指长江三峡地域范围内与旅游活动有关的并有助于旅游者增长文化知识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它是

一种以峡江山水景观文化和水电旅游文化为主要特色,以巴楚文化为内蕴的综合型的地域旅游文化。”^[9]以此内涵理解《三峡通志》的旅游文化价值,我们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论述:

其一,志书中丰富的诗词歌赋及铭记文献,为开发三峡地区的旅游文学文化提供了史料来源。前文已有所论,《三峡通志》所辑文学作品共计209篇(首),虽然仅是历代先贤歌咏三峡的古诗文选录,但已是绝大部分。在今人颜其麟编注的《三峡诗汇》中,“自西汉以迄晚清,分西陵峡、巫峡和瞿塘峡三大部分,凡二百六十三首。其中西陵峡八十一首,巫峡五十首,瞿塘峡一百三十二首。”^[10]通过比较可知,吴守忠的搜集范围十分广泛,诸如历代诗人题咏的《巫山高》,李白、杜甫、白居易、欧阳修、苏轼、王十朋、王士禛、张问陶等名人题咏三峡所留下来的精彩诗词,以及屈原的《楚辞》、宋玉的《高唐赋》与《神女赋》、陆游的《入蜀记》、范成大的《吴船录》等。更为重要的是,志中所辑录的一些文献迄今已经失传,而由于录存在《三峡通志》中才得以流传至今。以杜甫诗为例,《三峡通志》共辑存杜甫三峡诗22首,其中《西溪》、《高唐观》两首七言诗,查《杜诗详注》、《全唐诗》、《全唐诗补编》均未收载,疑为佚诗。因此,《三峡通志》中佚诗歌词赋的辑录,丰富了三峡文学文献的内容。三峡文学是三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开发三峡旅游文化资源,就不能不特别地关注三峡的文学。《三峡通志》中的文学文献,歌颂了三峡,反映了三峡的大好河山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其二,志书中留存的大量人物资料,为深入发掘与认识三峡地区的名人旅游文化提供了史源。据笔者统计,在《三峡通志》中,留有作品的著者共有118人,时代跨越先秦至明中后期,如宋玉、郭璞、诸葛亮、杨炯、卢照邻、陈子昂、李白、杜甫、张九龄、李商隐、陆游、苏洵、苏轼、苏辙、王十朋、范成大、杨慎、欧阳修、司马光、寇准、王安石、刘基、阎立本、黄庭坚以及地方官吏,如吴守忠、黄清老(儒学提举)等。在《三峡通志》卷五附录中,专门有“圣贤过化”、“名宦流芳”、“乡贤

遗响”、“达人流寓”、“楚襄王神女”诸条,介绍三峡地区的名人英才。三峡不仅以它独特的山水取胜,而且它的名人文化资源也十分丰富,所有这些都有利于三峡地区旅游文化资源的综合开发利用,有利于三峡地区建设成富有吸引力的大型综合旅游文化区。

其三,志书中录存的诸多风俗史料,为三峡地区民俗旅游文化的开发提供了多元因素。吴守忠《三峡通志》在卷五附录“峡俗丛谈”中涉及到了三峡地区当时的风俗习惯:“夔人重武侯,以人日倾城出游八阵蹟上,谓之踏蹟。妇人拾小石之可穿者,以綵索繫于钗上,以为一岁之详。”“夔民寡妇多招赘婿,甚至年踰五十,有二三子亦行招赘,间亦有弟赘兄嫂。其男子有妻妾者,利寡妇之资产,辄过寡门为赘,久则花费其财产,变卖其人口,遂起讼端。”“峡民男为商贾,女当门户坐肆于市廛,担负千道路者,皆是妇人也。”“自五月至八月,江流泛滥,瞿唐不可上下,舟船当戒,谓之封夏,又曰封峡。”类似这样的记载还有若干,从中可以考见明代民俗学的史料。通过对这些风俗史料的解读,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三峡地区的日常生活习俗(服饰、饮食、居住、出行)、婚姻习俗、丧葬习俗以及少数民族的风俗等,从而为三峡地区民俗旅游文化的开发提供了借鉴。同时,通过对三峡地区民风民俗的考察,我们可以窥见三峡风俗的区域色彩以及内部差异,从而更有利于深入挖掘三峡地区的风俗概况与社会变迁的关系。

其四,志书中众多的名胜古迹的地理资料及其典故传说,可作为今天保护文物、开发三峡地区山水景观文化资源之用。三峡地区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三峡旅游文化景观的优势特色,具有文化遗址多、名人胜迹多、民族风情浓等突出特点。在《三峡通志》卷一“三峡考”中,记载了颇多名胜古迹,其中“夔峡考”中共有30个,比如白帝城、丞相庙、滠滩、百牢关等;“巫峡考”中共有32个,比如阳台山、孔子泉、十二峰、神女庙等;“归峡考”中共有62个,比如秋风亭、石门滩、翰林亭、黄牛山等。作者在记录这些名胜古迹时,不单单是列出名称,而是在它们背后都有简单的介

绍或附以典故传说,试举二例:如“铁锁。白帝城下崖穴中,宋景定五年,守将徐宗武置,以拦江。计七条,二百七十七丈五尺,五千一十股。”^[11]

“孔子泉。县东半里。说者谓,旱而祈则应,泉旁之民虽童子亦能书。王十朋集诗略云:巫山亦有泉,可饮亦可祈。泉旁人农家,聪慧多奇儿。父母偶加教,圣门皆可归。”^[12]另外,在《三峡通志》卷五附录中专列有“帝王胜迹”、“圣贤过化”、“江神显应”、“岩洞搜奇”、“崩洪纪异”等目,亦是关于三峡地区独特的人文景观的记载。灵奇山水与独特的人文景观相合配合,构成了三峡旅游文化中异彩纷呈的光华。对《三峡通志》中记载的名胜古迹进行挖掘并合理使用,势必会推动三峡旅游文化向更高层次发展。

有学者指出:“旅游活动是旅游主体、旅游客体和旅游中介体相互作用形成的社会综合现象。长期以来,人们却偏重于旅游的经济属性,偏重于旅游的经济性研究,而忽视旅游的文化属性及对它的研究。殊不知,旅游文化是旅游业得以发展的灵魂。”^[13]旅游是文化的载体,没有文化的旅游显得苍白无力,旅游文化是旅游业的灵魂。因此,我们在进行三峡旅游资源开发时,不但考虑其经济利益,也应强调旅游更深层次上的文化价值,这种文化价值包括历史、艺术、人文等方面的特点和积极功能。当代学人对明代《三峡通志》的研究,不但要论述其史料文献价值,也要从现实关怀出发,以便使志书记载内容真正为社会现实服务,从而促进三峡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

三、余论:方志与三峡文化研究

目前,结合三峡地区的历史与现状,充分发掘与利用三峡地区固有的信息资源,建设独具风格的三峡区域文化,日益成为政界与学界的共识。三峡文化博大精深,诚如冯天瑜先生在《三峡文化研究丛书·总序》中言:“三峡文化作为一种始源性文化,独立展示了人类社会由野蛮到文明的系列演进轨迹;作为一种区域民族性文化,具有鲜明的‘巴楚混合文化’特色;作为一种移民性文化,源远流长,积淀深厚,可资借鉴;作为一种

‘景观文化’，有着独具魅力的峡江自然风光，位列全国旅游胜地四十佳榜首；作为一种经典文化，古往今来的墨客骚人留下了浩如烟海的高品位诗文传世。此一系列与我国其他地域性文化迥然有别的基本特征，充分显示了三峡文化的独特性、丰富性与无穷的魅力。”面对这样一种多元融汇、兼收并蓄、底蕴厚实的文化体系，史料的发掘就显得尤为重要。

依笔者来看，关于三峡的文献史料重点包括下述内容：反映三峡历史地理沿革的文献、与三峡地区相关的史实文献、记载三峡的诗歌词赋铭记文献、与三峡地区相关的出土文献。这四个方面都有其严整的体系。对于传世文献，我们除了继续研究与三峡地区有关的正史、笔记、文集、诗词之外，应把更多的目光转向方志与族谱。本文对《三峡通志》的研究，就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不同时代的三峡地区的方志为我们留下了三峡文化

演进的痕迹，是对这个地区直观而全面的描述，我们在这里看到了疆土之上的山川物产、历史风俗，很显然这些方志是我们研究三峡文化不可或缺的材料。

关于如何利用方志研究三峡文化，吴柏森先生给出了我们很好的答案：“可以考虑以‘方志’为中心线索，进而查考相关的文书档案、家乘族谱、史书地志、轶闻杂记、金石碑刻、诗词文集等等，将有关三峡文化的材料勾稽出来，加以梳理、分类、考释，形成三峡文化文献研究体系，进而与三峡考古文化的研究、三峡地域各族人民实际生活的研究，以及口头传承文化的研究融会贯通起来，形成三峡文化研究的系统工程。”^{〔14〕}三峡地区的方志从民间文人的情感寄托，到府州官吏的施政依据，逐步上升到国家管理的咨情问政，无论是山川风物的描述，还是疆域管辖的记载，都是三峡这片大地上，每一位中国人的千秋家国梦。

〔参考文献〕

- 〔1〕薛新力.巴渝古代要籍叙录〔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43.
- 〔2〕〔8〕〔11〕〔12〕(明)吴守忠.三峡通志〔M〕.明万历十九年刻本.卷一《三峡中额设公署卫所》，卷首《小引》，卷一《夔峡考》，卷一《巫峡考》.
- 〔3〕〔5〕〔7〕王世伟.传世孤本明版《三峡通志》考略〔A〕.上海图书馆历史文献中心编.历史文献的开发与利用论文选集〔C〕.上海:上海书店,2000.86,85—86,87.
- 〔4〕沈津.明代有关长江三峡的志书——《三峡通志》〔J〕.图书馆杂志,1984(3).
- 〔6〕(清)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八〔M〕.北京:中华书局,1965.594.
- 〔9〕曹诗图.三峡旅游文化概说〔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
- 〔10〕颜其麟.三峡诗汇〔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345.
- 〔13〕杨靖筠.旅游概论〔M〕.北京:知识出版社,2006.26.
- 〔14〕吴柏森.“方志”与三峡文化研究〔J〕.三峡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5).

(责任编辑 张 斌)